

命运的轮回与身份的焦虑

——长篇小说《伊敏河静静地流》的一种解读

□满 全(蒙古族)

《伊敏河静静地流》是达斡尔作家额尔敦扎布先生的汉语长篇小说。小说通过描写伊敏河畔上的敖拉家族的离合故事，向人们展示了作者对命运、身份、秩序的思考。故事情节复杂多变，带有悲凉的意味，给读者留下深刻思考。

命运——无可琢磨的诅咒

命运，到底为何物？很难说清楚，这是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命运”二字中，“命”为定数，是不可变的存在，“运”为变数，是可变的存在。“命”在天界，“运”在人间，这是一种对命运的广泛而古老的认知。定数与变数、不可变与可变、天界与人间，这是充满张力、富有想象力的叙述空间。

因此，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都津津乐道地讲述与命运抗争、与命运搏斗、与命运冲突的严肃故事。可以说，与命运的抗争是世界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其中最经典、最广为流传的是“俄狄浦斯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命运是预设的人生轨道，不可撼动。因此，与命运搏斗、抗争是徒劳的。这呈现出一种对立式的结构，即神与人的对立，或者天与人的对立。这是一种伟大的结构，结构能够产生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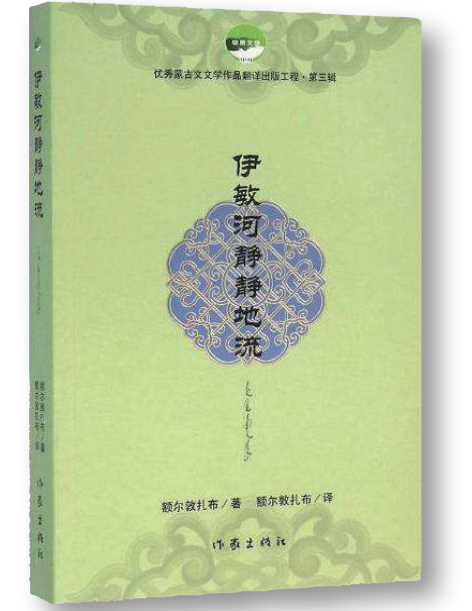
额尔敦扎布的长篇小说《伊敏河静静地流》也是一部讲述关于与命运抗争的故事。其中，主人公吉娜和阿荣最具代表性。这对母女都沦落于命运的魔掌和诅咒，但又有着微妙的区别，就如同曹禺《雷雨》中的侍萍和四凤。吉娜如同侍萍一般，她的命运带有偶然性以及时间维度上的直线元素；而阿荣则如同四凤，其命运带有必然性以及时间维度上的轮回元素。

作者通过描写命运的重复和轮回，试图表达对生命、人生，乃至宇宙万物的认知和看法。也就是说，生命、人生，乃至宇宙万物均有可能在各自的轨道上轮回旋转，日复一年，年复一年。宇宙轮回理念来自于佛教。其背后有一种豁达、忍耐、宽恕、包容的宗教主义。不必仇恨、不必急躁，一切均在轮回中。

这么一说，《伊敏河静静地流》和“俄狄浦斯故事”有类似的地方，就是如何抵抗命运的问题，而且也都属于一种对立结构。但我想，在这其中有着鲜明的差别。这种对立，不是神与人的对立，也不是天与人的对立，而是秩序与人的对立、或者社会与人的对立。这便是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在如何设定天、地、人这三大元素方面的不同之处。西方文学作品经常在人人与天地的对立结构中描写人物和事件，并进而探讨宇宙万物甚至经验之外的真理。东方文学作品经常在人社会的对立结构中描写人物和事件，探寻经验之内的人性。由此，《伊敏河静静地流》在某程度上体现出鲜明的社会批判性。

身份——隐形的社会结构

《伊敏河静静地流》着力描写的另一个主



题是身份的焦虑。众所周知，身份(identity)是社会学和文化学的概念，具有复杂的道德伦理内涵。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最典型的身份描写小说是雨果的《悲惨世界》。小说主人公冉·阿让经历了艰难、坎坷的一生。这一切磨难均与他的苦刑犯身份有关。对冉·阿让来说，苦刑犯身份是无法摆脱的诅咒和魔障，他要用一生的苦难和坎坷经历来抵消、终结强加给他的苦役犯身份。所以，冉·阿让是在身份焦虑的状态中度过了一生。

身份是预先设定的社会隐形结构，在某些情况下自主获得、自主改变，这叫做自致性身份；在某些情况下自然获得，但无法改变，这叫做先赋性身份；在某些情况下，外部强加，同时几乎很难改变，这叫做强制性身份。身份是具有文化色彩的隐形结构，也是一种文化表象和符号。《伊敏河静静地流》中，主人公吉娜的社会身份是属于强制性身份，是外部力量强加的结果，很难改变。也就是说，吉娜和名门贵族子弟的封建包办婚姻，使得她无意中有了另一种社会身份，即名门贵族的一员。在身份社会中，身份是一种责任，一种通行证，一种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换句话说，某个人得到某个身份后，某些事儿可以做，某些事则不可以做，某些事可以想，某些事则不可以想。在这其中，有一种隐形的监督力、无形的约束力，牢固地绑架了社会成员，这就是身份效应。

小说中另一个主人公阿荣的社会身份是属于先赋性身份，这也是无法改变的身份。也就是说，阿荣降生于名门贵族家庭，就便有了名门贵族的身份。但是吉娜和阿荣对贵族身份的认知和看法有所区别。在小说中，吉娜始终在身份焦虑状态中度过人生，而阿荣始终在身份认同状态中生活着。

身份焦虑和身份认同是两种心理状态和两种生存方式。因此，不难看出，这部长篇小说中有两条叙述路线，一条是身份的焦虑叙述，另一条是身份的认同叙述。两位主人公的结局虽然都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但悲剧形态有所不同。吉娜的悲剧命运来自于强制性身份，强制性必定带来怀疑和反抗，但反抗却不一定带来希望。所以，吉娜只能在痛苦、焦灼、苦闷中度过余生。但是阿荣不同，阿荣的身份是属于先赋性身份，是有生之年不可改变的基因烙印，而且她认同了这一身份，为此骄傲。但在最后，阿荣受到侵犯，觉得玷污了自己的贵族身份，以投河自尽的方式告别了她的先天身份。

“身份”，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其监督力和约束力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不容忽视的。顽固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规范支撑着身份制度的延续性。在这个意义上，《伊敏河静静地流》是一部文化小说，其批判矛头指向于文化体系，或者族群社会的权力系统。

贵族血统或者贵族身份，是这篇小说中始终贯穿的一条线。有人认同、拥护、崇拜贵族身份、贵族血统，有人怀疑、焦虑、背叛贵族身份、贵族血统。小说着力痛斥几千年延续下来的身份制度及其传统，并表达了解构、终结、颠覆这种传统的愿望。

传统是庞然大物，其顽固性带来了它的稳定性。那么怎么终结、解构、颠覆强有力的坏传统呢？这部小说试图以内省方式来解决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贵族传统。所谓内省方式，就是指苏醒、醒悟起来的文化民众自觉修复、改变，或终结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因此，也可以用“和平演变”这个词来形容内省的方式。和平演变或者内省方式对应的是暴力演变，或者外控方式。

在小说尾声，如何确定小圆圆的身分成了一大问题。作者怎么处理这一问题，直接影响整部小说的价值取向。小圆圆的身分非常复杂。小圆圆是阿荣和贵族公子哥铁木尔的儿子，可是父母最后都死去了，由祖母吉娜一手养大，上户口的时候，只能以拉勒仁(与阿荣同父母)养子的身份。小圆圆当然有贵族的血统，但如果深入追溯回去，她又是穷苦人家朝鲁的后裔。这一复杂身份背后，法律法规与情感纠葛拧成一团，很难分清。这就涉及如何修复、改变，或终结族群社会的传统问题。大家商讨一番，最终同意吉娜的意见，把小圆圆的身分确定为“牧民”。这一处理方式，完全表明了作者的意图，那就是传统可以修复、终结，但求内省方式。

作者通过描写吉娜不幸的一生，回答了人类面临的问题，那就是向往幸福是人类社会的本质，但是通向幸福的道路充满坎坷和泥泞。这也许是这部长篇小说的深层含义吧。

作为当下哈萨克族颇具代表性的作家，1938年出生的乌拉孜汗·阿合买提，其文学创作历程已经超过了60年。如今，他依旧在用母语孜孜不倦地笔耕不辍。碍于我不懂哈萨克语，所以读其作品的机会并不算多。多年前，在一本伊犁作家小说选中看过他的一篇《婚礼之夜》，记忆犹新。后来了解到他的中短篇小说集《骏马的后裔》推出汉文版，我赶紧找来阅读。

这部中短篇小说集收入了《山村纪事》《骏马的后裔》《八十号大院》《朋友的心》《繁忙的一天》《拉赫木拜》《远方的篝火》7篇小说，展示了乌拉孜汗·阿合买提多姿多彩的创作成果。手边有一本哈萨克文学史，对乌拉孜汗·阿合买提辟有专章介绍，认为他善于从爱情、婚姻、家庭的角度，来审视时代生活在人们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上引起的变化，发掘普通人的美好感情。当我看完《骏马的后裔》，觉得这个评价非常正确，但似乎还不够全面。

在《山村纪事》中，主人公凯米勒生活的地方，“什么都可以活得像他自己，什么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凯米勒本来过着“跟传统的哈萨克族人认为最好的活法没什么两样”的生活，可他偏偏爱折腾，离开了“自己的位置”，不嫌麻烦地搬家到之前住的远山牧场，所有的麻烦都因此而来。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各种观念的差异与冲突，都让老牧民凯米勒感到茫然，经过一番“折腾”后，他终日守着天使泉，“心里还是有一些深深的不安，好像他以后再也喝不上那泉里的水了”。然而我们知道，除了喝不上泉水，他还有更多的不安。

这种不安也体现在其他人物形象的心里。这些有着浓郁哈萨克族生活气息的小说，在展示农牧区风情的同时，更多表现的是在历史变革的大时代中，世居草原的农牧民的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经受的考验。他们有不屈的奋斗和无奈的失败，有坚定的固守更有勇敢的反思，最终不失去向往和希望。《骏马的后裔》既是写马，更是写人，刻画了许多生动的形象。

在人物塑造上，中篇小说《八十号大院》颇值得关注。作品所写的几个人物也都性格分明，人物塑造得也比较丰满。小说从报社编辑别克铁木尔克服重重困难搬到八十号大院开始起笔，写到了同住在大院的多位邻居。作品通过一个大院几家人的活动和矛盾纠葛，勾心斗角，反映了社会一角的世态人情，也折射出了生活在社会转型期形形色色人物的复杂关系。别克铁木尔正直、善良、容忍，艾力木别克官气十足，马坎狡诈圆滑，穆萨拜头脑灵活、广交朋友、巴结领导、信奉金钱万能……这些人物都让人读后难忘。

乌拉孜汗·阿合买提的小说叙事流畅，作品也多承接着哈萨克族文学的传统。他善于化用哈萨克族民间俗语，语言生动幽默，颇具民族特色。他还善于运用比喻。马在哈萨克人的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乌拉孜汗·阿合买提在多篇小说中以马为喻——“像一匹铆足了劲的跑马”，“像一匹被鞍子磨了背的马”，“像一匹已经长大的小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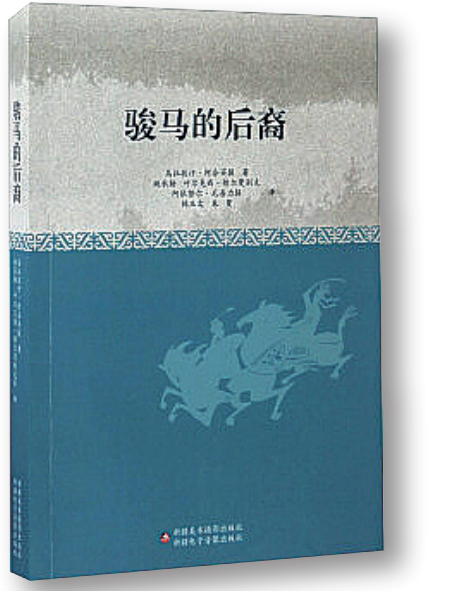
骏马奔驰在草原

——读乌拉孜汗·阿合买提小说集《骏马的后裔》

□毕亮

评论家李建军在谈到哈萨克族作家朱马拜·比拉勒的创作时说，朱马拜·比拉勒的小说叙事服从一种健全的自然主义伦理观。这里的“自然主义”，是说他的小说叙事像大地一样，有着坚韧而豁达的生命态度和宽厚而包容的情感态度。这样的评价同样适合于乌拉孜汗·阿合买提的《骏马的后裔》。《骏马的后裔》中的诸篇作品大多围绕着上世纪80年代前后社会转型时期的哈萨克族农牧民和回城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这一主题来展开写作。正如作者在一次采访时说的，“哈萨克农牧民由于受传统观念、生活习俗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在社会改革发展的道路上面面临着各种冲击。我想通过我的作品表达一种信念和希望，就是哈萨克农牧民像其他各民族农牧民一样，也在不断创新和进步。”

这种“信念和希望”在短篇小说《拉赫木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我”在下放牧场时认识了远近闻名的懒汉拉赫木拜。这个遭人嫌弃、被形容为



“懒汉的明天是永不完结的”拉赫木拜，觉得做什么“全都是白费劲儿”。就是这样一个“懒汉”，在改革开放后却用自己的双手盖起了“雪白的新房”，等到“我”和在专区某部门主持工作的哈力别克(他曾在这个牧场当过领导)再回牧场时，拉赫木拜家的破房子不见了，“眼前是挤满家什的三间不错的新房，外面垒起了院墙，沿墙种了一排茂密而笔挺的梧桐树。”拉赫木拜的懒，是时代造成的。离开拉赫木拜家回去的路上，“我”忍不住感叹：在这宽广的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在我们用汗水辛勤浇灌的大地上，生活着无数像拉赫木拜这样默默无闻的人，他们心中仿佛也蕴藏着巨大的理想、希望。

我想，《拉赫木拜》中“我”的这些感受，大概也是作者乌拉孜汗·阿合买提迫不及待地想要表达出来的。在这个时候，小说中的“我”和作者本人画上了等号。他正以笔为马，带着希望和信念奔驰在伊犁草原上。

诗情在苍茫中飞奔

——评诗集《天空高远，生命苍茫》

□杨盛龙(土家族)

岭上那温暖的阳光

□吴然



昆明进入了雨季，进入了汪曾祺先生笔下的雨季了——“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正是在这样的雨天，读到昭通彝族作家吕翼的长篇儿童小说《岭上的阳光》(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这“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美誉隽语，岂不正是对“岭上的阳光”的点赞！

据我所知，《岭上的阳光》是国内第一部拥抱脱贫攻坚、精准扶贫重大题材的原创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作品以中国大西南的云南贫困山区为背景，描写人和土豆的故事。

土豆，学名马铃薯，别名有好几个。在云南，特别是滇东北如昭通、曲靖一带，则被称为洋芋，甚至还流传着一句无调侃与自得的顺口溜：“吃洋芋，长子弟。”意思是吃了洋芋，男人长得帅，女人水灵漂亮。当然事实未必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洋芋的确好吃。作为云南人，我对洋芋情有独钟，读《岭上的阳光》则让我在亲切与感动中，对洋芋也就是土豆，有了别样的新的认识和向往。

小说的发生地叫野猪岭。一个高寒山区普通的彝族村寨。山梁之上，是一片又一片泛着铁红色的耕地，潮湿、松软，散发着泥土本来的香味。这铁红色的泥土，正是种土豆的宝地。12岁的小主人公、彝族小学生闰生，他家的土豆就种在这块宝地上。闰生的爸爸吉贵是一个勤劳的土豆迷，种土豆也享

受土豆。但是，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闰生像他一样，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就是为了能吃上土豆，填饱肚子。他要闰生好好读书，以后过更好的日子。吉贵是一个朴实本分的庄稼人。在野猪岭，家家供桌上方的神龛里，都供着一个大土豆，他们家虔诚地供着的，也许还是最大的一个土豆。他也曾外出打工，为孩子读书赚辛苦钱，但是他又回来了。因为他割舍不掉地里的土豆，割舍不掉火烧土豆的香味，还有因土豆而结缘的巧手的老婆。老婆做的“土豆八大碗”闻名乡里，是贫苦乡村中的一绝，吉贵看着岭上的土豆地，满脑子驰骋着自己朴素的渴望。

野猪曾经是野猪岭的霸王，“一猪二虎三老熊”，野猪排在第一位，野猪的厉害在于，它们也喜欢吃土豆。前些年，自然生态受到破坏，树林没有了，河沟断流了，野猪们无奈地远走他乡了。这几年，野猪岭的生态逐渐恢复起来了，野猪闻着土豆味，又回来了。它们用它们有力的猪嘴，拱开红壤土，对还在睡梦中的洋芋大开“吃戒”，把土豆地糟蹋得一塌糊涂。爸爸吉贵气极了，闰生也伤心极了：到了秋天，土豆无收，那不仅家里吃的不够，要饿肚皮，还有他上学费用，买书买本子买笔的费用，或者添一件新衣的费用，都没有了……

爸爸吉贵知道，野猪有被保护的特权，不能猎杀伤害，但是把这些不劳而获的家伙伙跑总可以的吧？于是他从小镇上“买来一堆鞭炮——火药很足、威力和响声很大的那种”，想把野猪统统吓跑。在和野猪的“战斗”中，大野猪丢下了一只小野猪，这只小猪让闰生牵肠挂肚。他不仅在梦中和这只小野猪相遇，而且瞒着爸爸，带上鼻子最灵的家狗闪电，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小野猪，悄悄地抱了回来。他给可怜又可爱的小野猪取名“小王子”，交给下了一窝猪崽的母猪，让小王子和家猪们生活在一起。

鞭炮吓跑野猪的事件，特别是少年闰生收养小野猪的举动，让“上管全村的扶贫大事，下管地里的鸡毛蒜皮”的驻村“扶贫工作队”知道了。他们从家猪野猪“和谐相处”的混养驯化、从开发土豆产品的加工制作中，找到了符合野猪岭科学扶贫、精准扶贫的办法。在不断的探索与实践，让人们有了获得感，也在岭上阳光的温暖中，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土豆花竞相绽放的美丽与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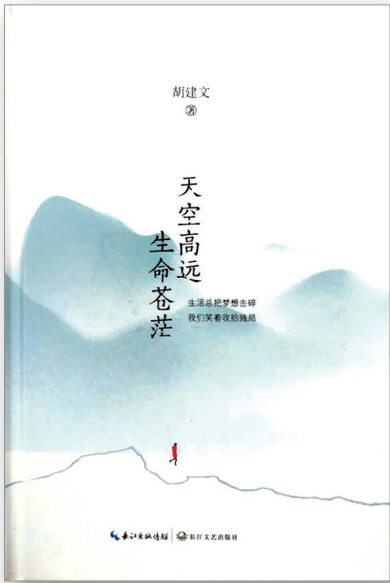
吕翼匍匐大地、深接地气的写作姿态，他把丰饶的现实生活转化为精彩的儿童文学表达，也特别让人感动和备受鼓舞。

胡建文诗集《天空高远，生命苍茫》广阔辽远、恢弘大气，富有抒情性，充满对辽阔空间的畅想、对生命的感悟、对故乡的挚爱、对世间万物的悲悯和痛惜。我读诗集《天空高远，生命苍茫》，读出了四种“气”。

胡建文的诗歌大气。这集中体现在他与诗集同名的诗作《天空高远，生命苍茫》中，“大地向南，我向北/风声向南，我的心音向北/大片大片奔跑的水稻，大片大片奔跑的玉米/大片大片奔跑的麦子，大片大片奔跑的云朵/天空高远，生命苍茫”。这是诗人在北去的列车上见到的景象，也可以说是飞机掠过大地时看到的景致。生命的列车飞奔，茫茫思绪飞奔，世间万事万物在眼前飞速来临，飞速撤退，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一切都渐行渐远。抬望眼，辽阔大地，茫茫山岭，浑浑噩噩的天空，浩茫宇宙，一切的一切，让读者思绪纷飞、浮想联翩。这首诗有着巨大张力，体现了诗人沉郁、悲悯、厚实的胸怀和气质，极具浪漫情怀。

再如《黄河》这首诗：“历史就是这么匍匐着前进的/九曲回环，浊浪苍茫/有时也站直了身子/仰天一声长啸/融尽了生命的雄浑和悲壮/翻浪一河血的沧桑”。沧浪黄河，仰天长啸，声震寰宇，滋润着东方儿女，奔流到海。恢弘大气，气贯长虹，震撼世人。

胡建文的诗歌充溢侠气。毕业于体育系，专攻武术，指尖生风，剑指苍茫，自称剑客书生。他一身侠气，北漂南闯，从事过多种行业。他写诗吟诗，是生活的积累，对生命和命运的感悟在体内膨胀，是“一场暴雨穿过内心”，“一种被鞭子猛烈抽打的痛快”，忍不住地“大喊一声”，是仰天抒发，对浩瀚寰宇的发问。胡建文的诗歌中，有无限的情感在流淌。其诗歌中的文字和感情，如同武打的老棍击打在地上，好似双节棍击起雄风，拍击出思想的火花、情感的惊雷。读胡建文诗歌，感到一股轰然之气奔腾在胸前，脚下虎虎生风。



胡建文的诗歌接地气。胡建文深入生活、扎根大地，其诗歌连接人民群众，特别是连接着故乡和亲人。诗人热爱故乡、亲人，深深地依恋他的乡土世界。乡土是诗人的“根”和“本”，乡村是他生命的底色。他的亲人常常出现在他的梦中，显露在其笔尖。他写父亲对伤痛、苦累乃至生死，“什么都不怕”(《父亲》)。他诗中的母亲，是“最婀娜最故乡的一种树/在风中在雨中/在儿女们晴朗空旷的记忆里/微笑站立，美到极致……”(《母亲》)他故乡的一个个亲人、邻居，那一个个普通的生命体，时刻牵动着诗人的心，跳跃在诗行，活动在他的情感深处，他常常想起，然后叙写在诗中。

诗人思念故乡，也常回到家乡，“刚出门就想着何时能够回家”。诗人“走到田边/才发现——/这么多年/我的一只脚/踏进了城市/另一只脚/依然没有/拔出父亲的稻田”。(《陪父亲到田边走走》)诗人的骨子里充满着

乡土的、田园的情愫，身心属于原野和大地。胡建文的诗歌满是“和气”，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之气。胡建文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充满对大地和天空的爱、对无数弱小生命的爱。诗人亲近自然，亲近弱小的生命，与“一位青蛙兄弟”邂逅，诗人高声朗诵诗作，青蛙兄弟仰脸呱呱评论，幽静的氛围中充满亲情(《我在大学教书》)。与一只蚂蚁相遇，“心有灵犀地互望一眼”，是“走在同一条路上的”好朋友、难兄难弟(《与一只蚂蚁相遇》)。一棵草站在路上，“深邃的目光/直指生命历程迷茫而遥远的方向”。一只小鸟从树上掉下来，其父母急得团团转，直到小鸟终于脱险，跟着父母飞向远方，诗人“柔软的心被两只急得团团转的鸟儿深深感动”，诗人想到自己，也是让父母担忧受怕的小鸟。小小麻雀在老虎嘴边觅食，那份自得和从容令人感动。总之，诗人对小小生命充满大悲悯大关怀。

诗人担忧环境的污染，从木炭市场的黑炭，想到那些木炭再度陷入火坑，“喷射出愤怒的火焰”，想到“身后洪水滔天漫过家园”(《在木炭市场》)。麻雀神秘失踪，“没有麻雀的冬天/再在雪地上/用木棒支起一个筛子/网住的，常常是我们自己”(《麻雀，麻雀》)。在动物园，诸多动物被囚禁，供人参观，“比动物多得多的人们/在动物园，不知不觉成为自己的囚徒”(《动物园》)。在诗人看来，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诗人呼唤环境保护，呼唤建设美丽家园，呼唤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对于胡建文的这部诗集，我只是粗读，从文字上得出点粗浅体会。好的诗歌，其深刻寓意常在文字之外。胡建文诗歌的文字之外富含澎湃的激情和深刻的思想。比如他的《呐喊》，“沉闷闷地只想呐喊一声/苦涩涩地只想呐喊一声/像一只笼中的虎/恨不得用呐喊咬掉全部的栅栏”。其中有着深厚的情思，但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值得用心体味。